

北京市语言学会 编

语言学的 理论与应用

YUYANXUE DE LILUN YU YINGYONG



商務印書館

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

北京市语言学会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143-0

I. 语... II. 北... III. 语言学—学术会议—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13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YǔYánXué DE LǐLùn Yǔ YìngYòng

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

北京市语言学会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143-0/H·1026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2

定价:22.00 元

北京市语言学会
《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编委会

主编 赵金铭

编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岑运强 崔希亮 贺 阳

鲁宝元 缪小放 徐丹晖

赵金铭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第五届(1998)和第六届(2002)学术年会的论文合集。1998年年会过后,与会论文经筛选后,曾以《关于语言的思考与研究》结集,交出版社,但终因众所周知的学术著作出版难,语言学论文集出版更难,而最终未能付梓。此次合集取名为《语言学的理论与应用》,一则切合年会的议题,二则体现学会成立之宗旨,注重应用,服务社会。

在1998年的集子中原拟收入张志公先生在医院中口述的《关于语法的再思考》,以及孙德宜先生的《齐如山〈北京土话〉动词补释》。现在两先生已归道山,离我们而去。今天,我们把二位先生的遗文收入合集,以资纪念两位语言学界的前辈。在2002年的集中收入林杏光、庞月光两位先生的文章,二位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收在合集中的论文作者,既有老一辈语言学家,又有大批中青年学者,显示了北京市语言教学与研究人员队伍的壮大。正是:阵容可观,实力雄厚,研究范围涵盖语言学学科各个领域,展现了北京市语言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

北京市语言学会是1980年成立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张志公、张寿康、胡明扬诸公倡议并组建了学会,至今北京市语言学会已经走过了二十二个春秋。

远在学会建立之初,志公先生就为我们明确了办会宗旨,其中

提到：为了发展语言学事业，一要搞五湖四海，二要扶掖青年。二十多年以后，我们越发感到志公先生的话语重心长。进入 90 年代以后，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的局面，在引进国外语言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汉语实际，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寻求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之路。因此，不存门户之见，尊重各流派的意见，努力开展学术争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搞五湖四海，而扶掖青年更是当务之急。现在，正值世纪之初，中国语言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重大挑战。老一辈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罗常培、吕叔湘诸位先生，他们崇尚科学，勤奋开拓，严谨务实，扶掖后学的美德，是我们中国语言学研究值得骄傲的传统。

在两届年会的与会人员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有年富力强具有旺盛学术生命力的中年学者，更为可喜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大批青年学者，刻苦钻研，脱颖而出。他们年富力强，知识结构完备，思想敏锐，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他们预示着北京市语言学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看到一代新人在成长，我们越发感到前辈学者扶掖后学的远大眼光。

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会员，也许有人还记得，1981 年 4 月到 11 月，北京市语言学会为了提高社会上人们应用语言的能力，曾请北京市语言学界著名学者王力、吕叔湘、周有光、周祖谟、张志公、朱德熙、俞敏等先生举办了一个“现代汉语讲座”，后来由知识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就叫《现代汉语讲座》，志公先生撰写序言，王力先生题签，这是一本十分有用的书。这也就是说，北京市语言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些切合社会需要、于社会有益的工作，尽一点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应尽的责任。本此目的，2001 年我们召开了重阳敬老会，北京市年逾古稀的老语言学家欢聚一堂，畅

叙感怀,使众多青年深受教益。我们还举办了“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座谈会,大家清醒地看到: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也在侵蚀着语言学的神圣殿堂。对此大家均有所感,都认为应十分警醒。在这两次年会上,我们都提倡不同意见的讨论,提倡学术上的争鸣。两次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进行学术交锋。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团结、和谐、民主的学术环境,这是推动学术发展不可或缺的。

北京市是首善之区,是人文荟萃之地,更是语言学学术研究的重镇。我们一定要秉承语言学界的优良传统,务实与创新相结合。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以飞速发展的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高新技术时代,发展语言科学,服务于社会,跟上时代的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让我们北京市的老、中、青语言工作者,携手共进,开创未来。

赵金铭

2002年3月

目 录

关于语法的再思考	张志公	(1)
《老乞大》单句句式	胡明扬	(12)
把握语言学史的总脉络——试论“五段两线三解放”	岑运强	(24)
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高一虹 李莉春 吕 珺	(42)
论民族语、母语和第一语言	李永燧	(63)
语文现代化新议	奚博先	(71)
论动词重叠的句法条件的限制	戴雪梅	(87)
齐如山《北京土话》动词补释	孙德宣	(100)
现代汉语名词槽关系系统的研究和实现	陈群秀	(147)
从“普通话水平测试”看北京语音中的不稳定成分 及相关问题	汪大昌	(167)
连城(新泉)方言今读阴平的古浊去字	项梦冰	(180)
《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介词	高育花	(188)
宋元差比句研究	谢仁友	(212)
《七一讲话》语句的 HNC 研究	林杏光 李 颖	(241)
汉语的根字和字族——面向知识处理的汉语基因工程		

.....	鲁 川(249)
日本留学生汉语偏误分析之(三):语篇中的非实指	
数量结构.....	吕滇雯(266)
太平天国女书铜币考.....	赵丽明(282)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实录资料的编撰情况及其应用	
价值.....	吕玉兰 张若莹(293)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	王世友 莫修云(305)
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	
关系的研究.....	江 新(317)
语言态度调查问卷的设计问题.....	王远新(330)
日汉熟语的对比与互译问题.....	鲁宝元(346)
试论朝鲜语与维吾尔语的共性.....	黄晓琴(369)
不会说话的孩子能认字吗? ——评徐德江、冬雪	
《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	庞月光(379)
法制新闻语言浅识.....	刘永章(394)
幼儿园早期阅读的实验研究——北海幼儿园认识	
环境发展语言课题组小结	富慧云 钱德慈 执笔(407)

关于语法的再思考^{*}

张 志 公

我这几十年，工作没什么成绩。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搞得太杂，杂而不成家。我所从事的杂七杂八、各种各样的工作，大概都还在语言的范围之内。就这个范围来讲，应该说，有一样东西是我几十年来没有间断过的——从自己学习、考虑、比较广泛地阅读，后来当编辑编东西，编语法方面的教材，语法跟我的关系，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断过。几十年里，教过外语，但也跟语法有关系。还专门讲过英语语法，讲过比较语法。搞语文，我是半路出家，不是科班出身。语文的范围也不止语法一个方面，可我做的工作，重点还是语法。

我开始对语法有些兴趣，也得益于我的老师吕叔湘先生。恰巧他的重点也是语法方面。他的成就很高，造诣很深，我无法与之相比。不过究竟他也是方面比较广，而且也集中在语法方面。我得益于他很多。比如说，我从他那里看到他编的中学教材（用英语写的），才知道耶斯柏森的《简明英语语法》。又因此知道了耶斯柏森的七卷本的英语语法，再进一步知道了……总而言之，耶斯柏森

^{*} 1996年2月6日下午于积水潭医院病房。奚博先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张志公先生本人审阅。

我就是从他那儿开始知道的。然后我索性读了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和《语言学概论》。我以此为突破点，慢慢儿地接触语法的東西就多了些。比如我们国内的老前辈马建忠、刘复那一代的著作，我也摸索摸索，看一看。我就是从这里入门的。

我有时候说到：学东西听人讲课当然很重要，不过常常地跟他聊天，那所得比听他讲课也不少。偶尔帮他做点儿什么事儿呢，还可以偷点儿什么来。例如，研究近代语法，找到材料的线索就很难，我就从吕先生那儿偷了点儿。我看到吕先生引的材料里有《三朝北盟会编》，其中有些接近于口语，或者说很接近于口语的材料。因为使臣回去向朝廷报告的时候，别的他可以做文章，但当时的对话，有的要原话怎么说就怎么记。于是这里边就出现一些接近口语的大白话。历史著作里居然能找到这种素材来源。《景德传灯录》——和尚语录里有材料，我也是从吕先生那儿知道的。

“偷东西”，这也算是一条治学经验吧。

我真想不到皇帝的文集里头有材料。这个我指的主要是朱元璋的文集——《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里头的文章很明显地有两路，绝大部分是他的高级秘书（大概是宋濂等等的角色）给他起稿的，文章的章法字法都是漂亮得很。这个皇帝老兄他自己动不动手发痒，也写一篇。尤其是那些跟外国办交涉的，他自己写，大白话，甚至粗话都写进去。我为了这些材料花了不少钱，不惜工本地买到了一部《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

我还知道元朝典章里边有材料。后来知道的就更多起来了，什么戏曲小说啦，唐朝变文啦等等。我之所以能知道这里头有我们需要的语言材料，都是“偷”来的。我没有学历史，没学法律，也没学佛学，又不是搞文学的，我知道这些，都是我东敛点儿西敛点

儿,东偷点儿西偷点儿,这样慢慢儿搞起来的。几十年来我倒是跟这种各式各样的机会没有断绝关系。

建国后,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咱们那个6·6社论就发表了。那个时候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出来了一个经典。一件大事是我们的6·6社论发表。斯大林的著作里头大讲了语法。因为他写这个书好像就是由于他们的语言学界,特别是语法学界闹派性,学阀马尔在那里统治了语言学界,硬说语言有阶级性。这个语言学派挺厉害,谁都不敢碰,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种局面下,不得已,只好、也只有请斯大林出马来讲“语言没有阶级性,它一视同仁地为各阶级服务”。

马尔那帮否定语法,这倒也无独有偶。西方也有那么一派不要搞语法:什么对啦错啦的,不要理这个,Let it be,随它去。

结构主义者也有一部分这样主张:我们只管描写语言现象,什么对啦错啦的这个我们不管,这不是我们的事儿,这是学校教师的事儿。所以有专家语法、学校语法的分法。专家语法只管描写,只管有什么说什么,不管对不对、错不错。他们认为,讲语法不必讲什么对不对、错不错,那说不清楚。而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里大讲语法的重要性,大讲学习语法的必要性。

而在我们这里发表6·6社论,为的是要“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所以么就匡谬正俗。那时候社会上使用语言相当混乱。于是请几位先生发表一些短文,指责一些使用语言不健康的现象。例如:叶老写过类乎“吃饭”的问题,吕先生写过《读报札记》。逐渐地就有《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小文章,提出了问题和建议,要求各级各方面的国家机关,特别是干

新闻的、语言的，大家都要学点语法、修辞、逻辑，不要总说不通的话。再进一步，学校都学语法。建国以前，并不是所有的中学小学都学语法的，小学尤其不学，中学则因人设事：这个学校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在教国文，他恰巧是跟黎先生学了语法去的，于是就请他开个语法课，没有这样的老师就不开。当时语法在社会上并不普及。

经过刚才说的几件大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发表，我们自己6·6社论的发表，《语法修辞讲话》在报纸上连载，掀起了全国学习语法修辞（首先是语法）高潮。大量的机关单位，还有工农速成中学、各种补习学校，纷纷开设语法课。像我这样的年轻小伙子，也被请去讲语法。请我去讲语法的都还是些大地方，像那个时候的政务院业余补习学校、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干校等等。许多大机关、大衙门，都在那儿纷纷地讲语法。我正赶上这个高潮。

于是乎么，又进一步决定，在中学里搞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汉语教学里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主要部分，是语法。人民教育出版社受命准备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当时以原来的中学语文编辑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学文学编辑室，调了几位文学家来充实这个编辑室。汉语怎么办呢？比较而言，那个时候还是重文轻语，觉得汉语没什么，好办。于是就委托吕叔湘先生来编汉语教材。吕先生说，我一个人不行啊，得找个帮手。领导说，你说吧，找谁。于是吕先生说，张志公编通俗普及刊物，他对通俗普及工作有经验。编中学教材么，要通俗一些，不能那么艰深，所以让他来帮我一起搞这个工作吧。于是就委托吕先生和我两个人给他编汉语教材。

可是受委托干这个工作很不方便。教育部有什么关于教材的重要文件？给不给我们哪？有关教材的重要报告通知不通知我们去听啊？通知吧，我们不是教育部的干部，不通知吧，叫我们编这种教材而大政方针又不叫我们知道，那我们怎么编哪？我们想征求征求意见，开个座谈会，怎么开、在哪儿开啊？喝杯茶也得要个茶叶钱哪。诸如此类的不方便的零碎事情很多，彼此都觉得麻烦。经过研究，决定也成立汉语编辑室，跟中学文学编辑室一样。于是也找了几位对汉语比较有研究的同志，我就调了去负责这个编辑室，当编辑室主任，吕先生当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在业务上指导汉语编辑室的工作。这样我就正式地下海，编教科书去了。这样一来，我跟语法的关系当然就更进了一步。

几十年来我跟语法打交道，其间也包括我有一段时间负责外语编辑室。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是这样一个机构：学校有门课，出版社就有个编辑室管这门课的教材，所以出版社的编辑室有化学、物理以至于音乐、体育。独有外语没有编辑室。外语教材以前都是委托外边的学校（比如北师大、北京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来编。这个委托也不方便，所以后来决定设立外语编辑室。外语编辑室得有人管哪，想来想去，我是学外语出身的，服从工作需要，我就得“归队”。于是我又干上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里头也有很多语法问题。那会儿一切学苏联，学直觉对比法。于是就大批直接法，说直接教学法是唯心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呀！）。凡是倡导直接法的，都批得焦头烂额。所以外语教学法里边语法问题也是很突出的。

由于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感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引进引起的。引进是大大地好事。自己缺什么东西，人家有，就先拿

来再说。但是不能老引进。开始引进,像马建忠那样的,那功劳是大大的。可是引进的同我们自己的语言不尽相合。不搞这种工作不觉得,搞了这种工作,就处处感觉到有不少格格不入的地方。我吃亏,或者说占便宜在一个问题上,就是我搞汉语语法没有师承。我向吕叔湘先生学习,主要不是坐到他教室里边听他讲语法,而是偷偷摸摸地学一些怎么样研究语法、怎么样收集材料、怎么样运用参考资料参考书。如此而已。我不像吕老先生的及门弟子那样真正有师承。有师承,根底厚,自己正式地下功夫学过,老师下功夫教过。我吃亏,我没有。不过要说占便宜呢,就是成见比较少一点,容易看见一些问题。真有师承的,比如梅派,他听梅兰芳就挑不出毛病来,而是每一句都好,每一个字都好。程派听程砚秋唱也无疵可指。没有师承呢,就会客观一点,成见少一点。

因此我看到语法研究中各家各派都在引进,由于引进而产生了不少问题,讲汉语语法,有些地方讲不通。我们的词类问题就是。到底词能不能分类就有不同意见。能分类的,分法也不一样。你这么分,他那么分,我们叫做体系分歧问题。其实有的就是个名目问题。反正都是孩子,爸爸说叫阿猫,妈妈说叫阿狗,两个吵一架,吵半天还是爷爷说什么算什么。我们语法学界谁给起名字?各家自己起自己的。名称问题,谈不上什么体系问题。有些真是体系问题,那是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

其所以如此呢,就是由于引进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的语言本身不尽吻合。不尽吻合,许多东西就讲不通。讲不通就各自想各自的办法。比方说,“这个字我不认识”,黎老先生说这叫宾居句首。“这个字”还是宾语,但它不老实,离开了宾语应该在的位置,居到句首主语那儿去了。有的说不是,宾语就是宾语,宾语只能在屁股

后头。“这个字”在前头，是主语，后头的“我不认识”是主谓短语作谓语。这些年，有一种更高明的说法——这个也根源于外国，叫做区分主题和主语。“这个字”是主题，“我”是主语。主语必须是那个做什么事儿的。“这个字”呢，是个话题。

这区别主题和主语也是舶来品。我们就是引进，引来也自成一家，能力真强啊！你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有这么多不同的讲法。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来自于西方。西方的这些理论是怎么产生的呢？西方的学者们并不都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之所以体系这么多，就是因为引进的东西跟我们自己的语言不尽吻合，于是就各想各的办法。我有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大家钻在一个牛角尖里头，出不去，于是都想咬个洞钻出去，都不想退出来另找一个牛角。大家拱在那一个牛角尖里头，分别地想钻洞，于是乎就钻了不少的洞。这就是我们的体系分歧。如此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吃了一些苦。我跟人商量过、讨论过，自己也反复思考过、试验过。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没有允许我走出一条路来。当然也怪我自己，学力、能力不够。但是问题一直摆在那里，而且很突出，很严重。我们背着这个问题跑了不短的路，跑了不短的时间。

再一个问题是教跟学的问题。怎么样使语法有用而又不难学？话么人人会说。两岁左右的孩子，日常生活的话就差不多了。可他越学越不通。这个事情倒奇怪了。怎么会越学越不通啊？匡谬正俗，那个谬，那个俗怎么越来越多，以至于非得请大专家，下大功夫，在大报纸上“匡”“正”？我们自己学母语，本国语，一般都是直接法。可以后又学语法、教语法，也用翻译法。用什么方法来学语法、教语法、编语法教材？人家说汉语语法难而无用，有的作家

发狠说要扭断语法的脖子。汉语语法最大的罪名是难而无用。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背着这个罪名。

外语，同样是那个语法，学不学啊？又是归纳法、演绎法，又是语言哪，言语啊，在那里闹不清楚，也在那里打语法官司。可见这种官司不仅我们在打，外国也打。像美国，传统语法行不行啊？结构主义语法行不行啊？转换生成语法行不行啊？热闹得很。以至于叫卡特总统来发言，说是你们搞各种学派的，你们去搞研究、搞实验去，在基础教育里边，就是传统语法。这是在美国，卡特表态。同样的辩论，在日本也发生过。

就更大的范围而言，用什么方法教外语？又是视听法，又是情景法，又是功能法，新名词也多得很。我们应该怎么办？哪一种是比较合理的？有人说方法没什么，一个和尚一个磬，一个师父一个令。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没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也没有什么对不对错不错的。是不是这样呢？方法就不能比较吗？会不会有一种方法效果就是好一点，效率高一点，而另一种方法效果效率就是差一点呢？传统讲究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也是一种方法。有的说那个不好，太死了！可是咱们过去就是要背，什么都要编个歌来背。学中医有汤头歌，学打拳也有歌，什么都有歌。这也是一种方法嘛！所以这方法也应该研究。

说得严重一点，方法可以流于主观唯心主义，有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天生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人是无能为力的。方法论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语言教学，首先我关心语法教学。教跟学，什么方法比较好？能不能找出个比较好的方法来，学起来挺有意思，又真管用？

闹了几十年，言语教育的这两个问题一直苦恼着我，到现在我